

HUSHI

胡
适

谈佛学

TAN FOXUE



新编胡适国学文丛

胡适/著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胡适谈佛学



新编胡适国学文丛

胡适 / 著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适谈佛学/胡适著.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13.1

(新编胡适国学文丛)

ISBN 978-7-5484-1311-0

I.①胡… II.①胡… III.①佛学-文集 IV.
①B9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6652 号

书 名: 胡适谈佛学

作 者: 胡 适 著

责任编辑: 韩伟锋 任 环

责任审校: 李 战

封面设计: 阿元工作室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 349 号 3 号楼 邮 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网 址: www.hrbcbb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b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87900272 8790027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

销售热线: (0451)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1311-0

定 价: 30.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服务热线:(0451)87900278

本社法律顾问: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

本书仅限在中国大陆销售!

总 序

李世跃

2012年，是胡适诞辰121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也许是因为这样一个有点特殊的年份，胡适的名字又一次活跃在人们的视野，成为许多媒体的话题。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一直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说他是标志性的人物，一是他“以青年暴得大名，誉满士林”（季羨林语），不仅在哲学、史学、佛学、文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人文学科声名显赫，而且在社会活动、政治领域也为人瞩目，被世人誉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二是他的名字在整个20世纪都是中国现代学术领域最具争议的焦点，赞者捧入云霓，批者贬若草芥。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声名鹊起之后，一个世纪以来，在每次学术界的风云变幻之中，他都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绕不开的话题。

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过许多成就辉煌的文化大师，诸如史学界的王国维、陈寅恪、钱穆；文学界的鲁迅、郭沫若、林语堂；哲学界的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佛学界的虚云、汤用彤、任继愈……这些大师术有专攻，各擅所长，以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成果，名扬四海，成为一代宗师。和这些大师相比，胡适的学术研究不免显得有些驳杂而疏浅：他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部写完，即成绝响；《白话文学史》也是写完上部，再无下文。至于他颇为自许的史学研究、禅学研究，也都随兴而起，无疾而终，不仅缺少系统与条理，而且许多结论的牵强与粗疏一直为学者所诟病。然而这些明显的疏失似乎并不妨碍他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代表人物。在20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的运动中，郭沫若曾经做过这样的总结：胡适是“学术界的孔子”，胡适批判应该把“文化学术界的一切部门都包括进来；在文化学术界的广大领域中，无论是在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建筑艺术、语言学、教育乃至于自

然的各部门，都应当来开展这个思想斗争”。这样的结论，从另一个角度证明胡适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影响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

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这种悖论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者回避，这种忽视或者回避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胡适解读的含糊和混乱：胡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的思想和学术研究究竟价值几何？为什么他会引出这么多截然对立的评价？在胡适去世 50 周年后的今天，对这些疑问的合理解答应当是今天我们重新认识胡适必不可少的前提。

这里，我们通过对胡适主要学术思想的梳理，试着为这种悖论的诠释提供一条思路或一些启发，为今天的读者认识胡适提供一些素材。

胡适一生给后人留下了数以千万字的著述，内容涉及人文科学的很多领域。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他所倡导的白话文理论与新文学运动。陈独秀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声称：“文学革命之风气，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20 世纪之初，批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是当时普遍的文化诉求，在胡适之前和同时，酝酿并推动这种变革的文人很多，如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等。与这些同人相比，胡适既是一位卓越的理论家，也是一个勤勉的实践者。他在《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中充分阐发了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意义，并且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为其找出了渊源。他特别明确地指出：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从《诗经》、《楚辞》、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五言诗、七言诗，直到小说、戏曲，“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上，哪一样新文学不是从民间来的”。这种鲜明、积极的文学史观，不仅破除了几千年来正统文学观念的束缚，为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提倡和发展找到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他鼓吹的“文学革命”有了广阔的前景和切实的可行性。在反复宣扬自己的观点的同时，胡适还通过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古典小说的考证以及对传统文学作品的重新解读，使自己的理论得到了充分的阐释和验证。至于他在诗歌、小说、戏剧等领域的创作，虽然稚嫩粗糙，但作为引领风气的实践，更为自己的白话文理论提供了鲜活的范例。正是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使得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在当时众多的喧闹中显得实在而详备、具体而生动，较之一般的号召和鼓动，来得更加真切而有生命力，从而产生的影响也就格外重大且深远。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和实践奠定了他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领袖地位，为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格局、思路乃至命题。

同样，胡适也曾 在 20 世纪初的中国哲学界掀起过惊涛骇浪。1919 年 2 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蔡元培在序言中称赞它有四大特长：“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梁启超更是称赞该书有三大特点，即“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谈到对当时人的影响，任继愈说：“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使人耳目一新……它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而敢于打破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不准议论古代圣贤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样的地位，供人们评论，这是一个大变革。”当时的中国，西学渐入，中学凋零，许多有志于弘扬中华文化的学者产生了很多困惑和焦虑：国学前途何在？做学问的路径何在？胡适的见解和主张恰好解除了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困惑，而这种“解除”的途径，就是新的学术眼光和新的研究方法。胡适曾极自信地说：“中国治哲学史，我是开山的人。这件事要算中国的一件大幸。这部书的功用能使中国哲学史变色。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部书的影响。”口气之大、自信之深，国人之中确乎少有。然而，历史证明：胡适所言不谬。虽然《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完成了上部，但它第一次以明确而清晰的西方实用主义的方法论颠覆了传统中国因循了几千年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它借鉴西方哲学的学术规范、理论框架和方法进行中西哲学融会贯通，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现代哲学的创立都作出了无法磨灭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哲学史研究之集大成者”的冯友兰，其学术观点与胡适始终分庭抗礼，但谈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也多次强调：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有开创之功的。

与此相对照，胡适的史学思想从一开始就充满争议和质疑。胡适的史学理论的核心是倡导怀疑的精神，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态度和实验主义的方法，去整理、发掘古代学术思想，为现实的目标服务。他认为，中国传统史学单纯以考察和证实历史为目的的研究方法已不能适应时代潮流，必须以历史进化的眼光和以古为今的标准重新审视。在当时，历史进化论和厚今薄古的观点并非胡适的首创，严复、康有为、章炳麟等人都是历史进化论的鼓吹者，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也都提出过厚今薄古的主张。而胡适与众不同之处则在于：他的怀疑和批判，不是简单的否定或摒弃，而是要从古人的思想中找出对今人有益的东西来，在符合客观史实的基础上，对古人思想做出新的评价。换句话说，整理国故的目的在于“再造文明”。

按照这种思路,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从当前的立场出发,对史料进行新的组织和诠释,批判地吸取精华,从而引发合乎现实需要的历史结论。在这里,历史已不再是史料的简单堆砌,而是现实人们有思想、有目的的“重构”。胡适的史学研究完全秉承了这样的宗旨:为了证明中国无为政治和自由主义的传统,他刻意强调了老子、孔子学说的相关命题;为了推广实证主义的理论,他重新诠释了清儒考据的治学精义。这样的史学理论一改中国历来“代圣人立言”的传统观念,着力强调现实的目的和实用的态度,把阐释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变成了干预现实的工具,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而且开启了一代“疑古”的学风。当然,这套理论所带有的强烈主观特色和实用倾向也招致了许多批评,“把历史当做一个随意打扮的婢女”,就是对胡适史学观点众多质疑中最为人熟悉,也是最形象的恶谥。

胡适的佛教研究,实际上是他史学理论的延伸,而他的禅宗史研究又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胡适的禅宗史研究主要是围绕神会和和尚的生平,整理历史上从唐朝开始到北宋时期中国禅宗发展的情况,考察中国禅的建立过程。胡适通过对敦煌材料和日本发现的材料的考证和辨析,指出正是神会和和尚的努力,南宗顿悟之说才成为中国禅宗的“真宗”。胡适把神会和和尚的努力视为“佛教内部的一种革新或革命”,从神会开始,中国禅宗进入了历史上的革命时期,是把印度禅转化为中国禅的时期。仔细研读胡适关于神会的一系列论述,不难发现:胡适之所以对神会在中国禅宗史上的作用极力推崇,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是因为他坚决地认为,神会给禅宗带来的改变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是带有转折意味和里程碑意义的。这种价值和作用,和胡适自许对于中国现代思想的改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用思想史的眼光、历史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禅宗史的学者。他的佛学研究不仅在国内是开创性的,而且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他在禅宗史研究中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学术界曾引起强烈的反响,而且直至今日也还受到相当的重视。

从上面的简单梳理中不难发现,五四运动以来,在新文化的思潮中,胡适的确有其不同凡响的地方:从文学革命到整理国故,从哲学研究到中西文化的讨论,在传统文化面向现代变革的很多方面,他都表现出独特的眼光和卓越的创造力;他学贯中西又不拘一隅,俨然成为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引领风气的通才。更为难得的是,在变革传统的过程中,胡适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在激浊扬清的同时,努力寻找一条基于传统而又变革传统的可行之道。他的立场可以有人反对,结论或

许受到质疑，但他所提出的问题、解决问题所使用的方法，却把中国文化从原有的封闭传统带入了现代世界，把中国传统的古典学术转变成现代学术。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带给现代中国的不是几部经典的理论著作，也不是若干精辟的学术观点，更不是几句振聋发聩的口号，而是一种立场、一种方法、一种面向现代的态度。李泽厚曾经做过这样的比较：“中国现代曾出现王国维、陈寅恪等史学巨匠以及顾颉刚、汤用彤、钱穆、金岳霖等，在学术上，都非胡适所能比拟。但他们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却远不能与胡适相比。这就是思想史与学术史的区别。”宋代禅师法演法师云：“鸳鸯绣出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说的是不要把治学的门径轻易示人。胡适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所希望且努力的，恰恰是将一种新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推己及人，“普度众生”。如果“鸳鸯”算是成果、“金针”算是修成正果的方法和门径的话，胡适自己绣的“鸳鸯”或许并不那么精美，但是他大力度人的“金针”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学术，而且在整个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

这，或许就是胡适虽然学术未为醇厚，但在许多领域依旧备受推崇的原因，或许就是胡适一生毁誉猬集，但历时百年无法被人忘却的理由。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关于胡适的思考还将持续下去，并会成为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命题。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认识胡适和他的思想自然成为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选编了这套“新编胡适国学文丛”。内容包括“胡适谈文学”、“胡适谈哲学”、“胡适谈史学”、“胡适谈佛学”，基本涵盖了胡适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很好地体现了胡适学术思想的基本面貌。“文丛”在内容的选择上首先注重反映胡适学术思想的精华所在，同时也力求表现其学术观点的完整面貌。因此，本丛书的编排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精心的考量：

首先是要选取最能反映胡适相关理论的代表作，如最早提出“文学革命”理论的《文学改良刍议》，最先阐述“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著名论断的《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

其次，除了不得已的减省之外，编者尽量全文选录，不对原文做割裂和删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有助于读者做出客观的评价。

最后，在文章类型的选择上，编者也尽可能兼顾文体、论题、文笔各方面，力求全面反映胡适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史学卷”为例，书中既选录了胡

适的中国史通论《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也选入了有关治史理论《研究国故的方法》。在具体的史学问题上，则选录了《两汉人临文不讳考》等一组文章，可以让人清晰地看到胡适在史学实践中的方法运用，加上那些短小精悍的读史随笔以及胡适晚年最为倾心的《水经注》考证的文章，胡适的整个史学风貌就显得丰富而生动许多。

这样的选文安排不仅有助于读者对胡适的研究成果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印象，而且也是对他学术思想的尊重和致敬。

当年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铭中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万千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有人认为，这段议论借用到胡适身上也有一定的道理。相信每一个认真读过胡适作品的读者，都会有自己的评价。

（作者系人文学者，现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

目 录



第一编 佛学史研究

《中古思想史》（节录）	2
从《牟子理惑论》推论佛教初入中国的史迹	9
中国禅学的发展	12
禅宗在中国：它的历史和方法	38
禅学古史考	54
楞伽宗考	68

第二编 佛学典籍考辨

《四十二章经》考	100
《楞伽师资记》序	113
跋《宝林传》残本七卷	119
跋裴休的《唐故圭峰定慧禅师传法碑》	130

第三编 佛教人物研究

菩提达摩考	142
荷泽大师神会传	151
记嵩山老安	184

第四编 佛教与文学

佛教的翻译文学（《白话文学史》节录）	190
禅宗的白话散文	204
诗僧与谐诗	210
十殿阎罗	213

第五编 杂记

海外读书杂记	218
《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序	226
所谓“六祖呈心偈”的演变	230
朱子论禅的方法	232
编后赘语	242



第一编

佛学史研究



◎ 《中古思想史》（节录）

佛教

一、在讲中国中古思想史第二期之先，应该先谈谈什么是佛教，并谈谈佛教本身的演变。

看 Farquhar: Outline of Religious Literature in India, 此书从《吠陀》(Veda)时代叙起，直到近代，包括印度各种宗教运动，各述其沿革变迁，并略举各教的重要典籍的内容及产生时代。这是一部最方便的参考书。

又 Sir Charles Eliot: Hinduism and Buddhism, 凡三六册，也把佛教和印度教并举，叙述颇详明。

参看本校钢和泰教授 (Baron Stael-Holstein) 的《印度古宗教史》讲义 (英文)。

二、在太古时代，一支阿利安民族 (白人) 从印度西北侵入印度，逐渐征服其地的黑色土人，遂建立了阿利安人的印度文化。他们带进来的宗教，都表现在最古一部分的《吠陀》书 (Veda) 里。他们崇拜许多大神，又有祭司专掌祀礼，最古的《吠陀》都是祠神的颂歌。其后凡祈祷之辞，乐歌之谱，祭祀的节文，迷忌的咒诵，都结成《吠陀》的一部分。祭司成为一种特殊阶级 (婆罗门)，与统治阶级 (刹帝利)、商人 (吠舍)，及农奴 (戍陀罗) 成为四个阶级。胜利的白人与被征服的土人接触日久，文化杂糅，宗教渐渐混乱堕落，成为诵咒祠祷的繁琐宗教。《吠陀》的最晚的部分，所谓《森林书》(Aranyakas) 与《奥义书》(Upanishad)，表示当时的宗教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意。遁世苦修，禅定冥想的风气，都在这时候发达起来；宗教的哲学也渐渐起来。这是佛教运动的背景。

看 Farquhar 页一一六二。

三、佛教创始者乔答摩，生于北印度的释迦族。他的生年已不能正确考定，多数学者认为生于纪元前 560 左右，死于 480 左右，则是和孔子同时。但近年又有人说他

死于纪元前 543 左右，那就早的多了。他的早年环境自是很安乐的贵族生活，后来忍受了很深刻的刺激，感觉人生不能避免老病死之苦，他就离开家庭，出来寻师修道。中间经过几年的苦修冥想，他忽然在树下大彻大悟，遂成佛道。佛是“觉”的意思。

看 Eliot, Vol I, pp.129-176。

看《长阿含经》一，《本行集经》七至三十。

四、佛成道后，即宣传他的教义，约八十岁时死。这个时期的佛教义，都很简单切近。其要旨为四谛（人生皆苦为苦谛，爱欲为苦之源为集谛，期于爱欲永尽为灭谛，出苦由正道为道谛），八正道（正见，正治，正语，正行，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五戒（杀生，偷盗，淫，妄语，饮酒）等等。《增壹阿含》（十八）所述四法：（一）诸行无常，（二）诸行苦，（三）诸行无我，（四）涅槃永寂，初期佛教的精义大观不过如此。万物皆由地水火风和合而生，故无常，又无我。推无我之义，在一身应没有持续的灵魂，在宇宙应没有主宰的神。但佛教徒在初期已不能明白这种哲学，故一面充分容纳古印度传下的多神教，一面又容纳轮回与果报的旧说。古印度的瑜伽（Yoga）禅法也收在佛教里，成为八正道之一。四阿含之中，已甚少精到的教义，但见神话连篇。但在字里行间，尚可窥见原始佛教反对咒术，故迦叶兄弟归依之后即将咒术之具尽投水中；又提倡无量的慈爱，打破阶级制度，故初期释众多是平民。此等处尚可想象原始佛教的革命精神。

看《增壹阿含经》的《高幡品》《四意断品》《四谛品》等。参看 Farquhar, pp.62-65。

参看梁启超《说四阿含》（《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

五、佛死后约二百年，有阿育王（Asoka）建立大王国，武功甚盛。晚年他归依佛教，佛教遂大兴盛。阿育王（约前 273—232）与秦始皇同时，他不但在国内大兴佛法，还派遣僧徒四出传播佛教。佛教从此成为世界的宗教。但传播愈远，流品愈杂，吸收的宗教迷信也愈多，原始佛教的本来面目也就愈难保存了。

看 Eliot I, pp.254-301, Farquhar, pp.66-73。

六、佛教徒在佛死后几百年中，时时起教义上的争论，遂分为许多宗派。最初分为（一）上座部与（二）大众部二部。其后上座部又陆续分八部，大众部又分十部，是为十八部，各部思想不同，经典也多不同。

看吉藏的《三论玄义》及窥基的《异部宗轮论述记》。吉藏早出，其书也比窥基

更清楚明白。参看梁启超《读异部宗轮论述记》（《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Farquhar, pp.104-110。

七、所谓“小乘”与“大乘”之分，是逐渐起来的，故时代不分明，大致总在西历纪元的前后（Farquhar 以为在纪元一世纪之末至二世纪之初，似乎太后了）。乘是一部车子，大乘只是一部更大的车子。佛教传播既远，异义增加了，那原来的小车子装不下了，不能不别寻一部更大的垃圾马车。Eliot 说大乘佛教有七种特色：一信仰菩萨，二侧重度人济世，三信佛具神力并有多身，四唯心的哲学，五新出的大乘经典，六释神像及咒术的倾向，七阿弥陀佛的信仰。其实这七项在小乘经典里都已有了种子，无一项不是逐渐演变出来的。Farquhar 说大乘有两大倾向：一者，佛教被印度教同化了，二者，旧日的戒律逐渐人间化了，遂使佛教更适合于上流印度人以及印度以外的各民族。此说较近事实。印度教化的倾向把原来佛教革命的精神完全毁灭了，咒术等等一律回来了，遂成一部无所不容的垃圾马车。但大乘佛教自有他的伟大精神。佛教大行之后，教中吸收了博学高明之士，如马鸣，如龙树等等，把他们的天才和学力贡献给佛教，造作种种伟大的经典，思想与文学天才都远胜于初期佛教徒，所以能为佛教史开一个新时代。

看 Farquhar, pp.111-118, Eliot, II, 3-62。

看《法华经》，晋译《华严经》的《净行品》与《迴向品》。《大般若经》太多了，可看《金刚经》及《般若纲要》。

看《维摩诘经》，及《中论》《十二门论》《百论》。

佛教的输入时期

一、佛教的输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时代，其正确年代已不可考了。我们所知道的有几点：（一）到东汉明帝永平八年（纪元 65），楚王英已奉佛教，佛教的名词已有三个（浮屠，伊蒲塞，桑门）见于皇帝的诏书中了。（二）恰恰一百年后（165），桓帝在宫中祠浮屠、老子，佛教已进入皇宫了。（三）次年（166）即有襄楷上疏论宫中祠浮屠、老子之事。襄楷是个儒教方士而信奉琅邪人宫崇的太平道教的，他的疏中两次引用《四十二章经》，可见《四十二章经》在那时已流行了。（四）约当献帝初年（190），丹阳人笮融在广陵、彭城一带割据，大起浮屠寺，以铜为像，有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

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这可证长江流域已有佛教。（五）同时交州有牟子博作《理惑论》，为佛教辩护，屡称引佛经，可证其时极南方与印度交通便利，佛教已大流行。

参看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梁任公近著》第一辑中卷），梁先生此文辨《四十二章经》及《牟子理惑论》为伪书，证据殊不足。看周叔迦《牟子丛残》。

看《后汉书》（七二）《楚王英传》；又（六十）《襄楷传》；又（一〇三）《陶谦传》。笮融的事，《三国志》（吴四）《刘繇传》最详，梁先生未考。

二、一二世纪中，佛书译出的都是小品，文字也不高明（《四十二章经》是例外）。到三世纪时，吴有支谦等，晋有竺法护等，译经很多，文字也因中国助手的润色，大致都可读。这时代正是中国士大夫爱谈《老子》《庄子》的时代，佛教的思想说空破有，以寂灭为归宿，正合当时士大夫的风尚。所以在三四两世纪之中，佛教思想渐渐成为上流社会最时髦的思想。

看梁启超《佛典之翻译》。

看《高僧传》卷一及卷四。

三、四五世纪之间，佛教出了三个很伟大的人物，遂在中国建立下了很深厚的基础。这三人是道安（死 385），鸠摩罗什（死 409），慧远（死 416）。道安有三大贡献：第一，他注释旧译诸经，使文理会通，经义明显。第二，他撰佛经的目录，使后世可考据。第三，他制定僧尼轨范，垂为中国佛教的定则。他的高才博学，受当时的学者崇敬，也抬高了佛教的地位。

看僧祐《出三藏记集》中所收道安的经序。

看《高僧传》（五）《道安传》。

四、鸠摩罗什是印度种，生于龟兹，少年博学，名满西域。吕光破龟兹（383），同他到凉州，住了十八年，姚兴征服吕氏，请他到长安（401—402）。他在中国先已住了近二十年，已通汉语，到长安后遂大兴译经事业，指挥门下名僧数百人，在八九年中（402—409）译出经论三百余卷。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的译笔明白晓畅，打破当时的骈丽文体，创出一种朴素流利的语体，不加藻饰，自有真美。他译的《法华经》《维摩诘经》《思益所问经》《般若经》《金刚经》《遗教经》《禅法要解》《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至今一千五百多年，还是最可读的名著。他的弟子如僧睿、僧肇等，都成为大师。

看《高僧传》（二）《鸠摩罗什传》，又（六至七）道融、僧睿、僧肇等传。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页一七一——一八七）。

五、慧远本是儒生，通儒书及老庄，二十一岁才出家，师事道安。后来他南游，开辟庐山，成为南方佛教一大中心。他招致外国大师，翻译经论；又与居士多人创立莲社，崇事阿弥陀佛，遂开净土宗派。当时桓玄当国，颇压迫佛教徒，要使沙门敬礼王者。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极力主张沙门遁世变俗，应“高尚其迹”。他的人格与声望为佛教抬高不少的地位。

看《高僧传》（六）《慧远传》。

六、中国佛教到罗什、慧远的时代，根基已立，地位已高，人才已多，经典也已略完备，“输入时期”至此可算完成了。

佛教在中国的演变

一、道安、鸠摩罗什与慧远都注重禅法。道安序《道地经》，称为“应真之玄堂，升仙之奥室”。他序《安般经注》，称为“趣道之要经”；又说“安般（出息入息）寄息以成守，四禅寓骸以成定。寄息故有六阶之差，寓骸故有四级之别。阶差者，损之又损之，以至于无为；级别者，忘之又忘之，以至于无欲也。……修行经以斯二者而成寂。得斯寂者，举足而大千震，挥手而日月扞，疾吹而铁围飞，微嘘而须弥舞。”读这种说话，可知当时佛教徒中的知识分子所以热心提倡禅法，正是因为印度的瑜伽禅法从静坐调息以至于四禅定六神通，最合那个魏晋时代清淡虚无而梦想神仙的心理。禅的理论最近于无为无欲，而禅的理想境界又最近于神仙。道安倡之，罗什、慧远继续提倡，五世纪初期以后，中国佛教发展的方向遂倾向于禅学的方面。

看胡适《禅学古史考》及《佛教的禅法》（《文存》三集页三九五—四四八）。又僧祐《出三藏记集》六至十诸卷中的道安、慧远、慧观诸人的经序。

二、戒，定，慧，为佛法三门。戒是守律，定是禅定，慧是智慧。倘使在那个旷达颓废的风气之中，忽然产出了严守戒律的佛教，岂不成了世间奇迹？如慧远岂不是守律最严的和尚？（看《高僧传》中慧远及僧彻传）但他议论佛法，终只是侧重禅（定）、智（慧）二途。智慧即是六波罗密中的“般若波罗密”。那个时代（四世纪五世纪之间），印度佛教正盛行龙树（Nagargana）一派的空宗，又称“中道”（madbgamaka）。他们说一切法都是空的，都是假名。这一派的思想含有绝大的破坏